

顶层设计”当以“底线共识”为前提

本报评论员

最近一段时间，以“顶层设计”为关键词的言论很是火热，它所对应的便是中国改革这一宏大命题。从上周闭幕的全国两会到日前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众多委员、代表、学者在谈到中国改革时，都不约而同地主张要加强“顶层设计”。这种现象反映了公众对于推进中国改革大业的深切期待。

简要归纳一番，“改革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在我国目前的语境中，表达了这样几个关键含义：一是要明确改革发展的价值，即通过科学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要提高辩证思维水平，从战略高度把握改革的大局和重点；三是要强化制度建设，保证制度平衡。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强调勇于探索，走一步看一步，那么“顶层设计”则主张运筹帷幄，理念先行。

应当承认，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理论界提出“顶层设计”有其积

极意义。不过，我们也看到，目前各方人士对于“顶层设计”的种种表述总体上显得有些空洞。有抽象的界定，但无具体的阐释；有激昂的呼吁，但无切实的方案。是“顶层设计”在中国当下面临的两大窘境。

何以出现这一窘迫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于“顶层设计”，各方人士在抽象层面上一致认同，但在具体层面上严重分歧。表现在改革方面，就是抽象地都同意改革，具体地却各信一套。以国企改革为例，多年来，“国进民退”派和“国退民进”派相互博弈，而双方都以改革派自居，且都主张加强“顶层设计”。就在日前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面对海外嘉宾发表的“中国大力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及众多学者对于中国经济领域中“国进民退”的批评，中国政府的高级智囊人士便予以反驳。至于在中国市场化的路径选择、房地产调控该收紧还是该放松、

民间借贷要不要开闸、官员直选是否合乎国情等问题上，各方人士更是各有说辞，莫衷一是。如此迥然分化的现实语境中，每人所谓的“顶层设计”到底是何具体面目，恐怕只有每人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与其戴着“顶层设计”的帽子高谈阔论，不如潜下心来，协商磨合各方观点，达成推进中国改革的若干“底线共识”。否则，“顶层设计”谈得太多太滥，反而会导致理论泡沫，从而遮蔽一些本可以着手加以解决的真问题。

在讨论底线共识之前，让我们重新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开启的1978年。此前的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社会严重封闭，人权被肆意践踏，计划经济占据垄断地位，而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对于它们的反拨与矫正。这是我们讨论并达成底线共识的逻辑起点。

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要实现这两大目标，首先，必须厘清划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其次，必须制约并监督政府的权力，建立一个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有限政府；其三，必须保护私有产权，鼓励自由、公平的竞争，与此相适应，就必须理顺产权关系，破除一切形式的垄断和特权经济。这是我们应该达成的第一个“底线共识”。

封闭导致偏狭和愚昧，开放促成宽容与进步。有政治开放，密室专制与权力寻租就无藏身之地；有经济开放，多赢的互通有无和高效的国际分工与合作就成为可能；有文化开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会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一个开放的国家

与社会必将前途无量。这是我们应当达成的第二个“底线共识”。

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当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且应当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归宿。所以，人的自由与权利至高无上，且不应被非法剥夺。而保护和实现人权，就必须依靠法治而非人治。这是我们应当达成的第三个“底线共识”。

我们认为，以上三个底线共识，应该成为改革派共同的、基本的价值观。改革派的观点如果有分歧，也应该是在认同这三大底线共识之上的增量观点的分歧。而是否认同这三大底线共识，也应成为区分中国当下改革派与非改革派或反改革派的分水岭。

达成“底线共识”和实施“顶层设计”相比，前者提倡从既有的经验与实践中遴选价值取向，后者则带有某种预见性和先验色彩；前者注重共同参与，后者倾向精英设计；前者较务实且便于实践，后者较务虚且容易流于空谈。鉴于预热于2010年并火爆于2012年的“顶层设计”迄今并未取得实际成果，我们主张，不妨先搁置一下“顶层设计”，而将达成“底线共识”作为当务之急。

谁是改革的对象？谁是改革的主力？谁是改革的同盟军？在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战的当下，有必要将这三个问题弄清楚。达成“底线共识”并以之为尺度，将能解答这一问题。不仅如此，达成“底线共识”，也是重建改革共识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改革派可以避免无谓的争论，腾出更多的时间去研究真问题，即便“顶层设计”继续口惠而实不至，只要有“底线共识”在，改革派也可以携手努力，将改革攻坚战切实推进。

■经济时评 | Hot Topic |

新供给主义 与中国经济科技含量

任寿根

据媒体报道，自2012年4月1日起，我国将对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装备和产品目录、进口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目录、进口不予免税的设备和产品目录等进行调整。对符合修订的《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和《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进口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商品清单》中所列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而进口清单中相关零部件和原材料商品，将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这项税收优惠政策调整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装备水平，更有利于中国加快引进、吸收和改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

科技产业是经济体系的“造血器”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想具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具有足够的科技实力，如果科技实力不强，国民再富有也称不上一个强国。现今一些国家的居民非常富有，但由于这些国家科技实力不强，仍然不能被称为发达国家或强国。15世纪、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称雄世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能走在世界科技的前沿，运用科技发展产业、发展经济。

新供给主义理论认为，如果称金融业是经济体系中的“血液”，科技产业则是经济体系中的“造血器”。新供给主义理论进而认为，后发国家要真正成为经济强国，要想成为先进国家或发达国家，就必须刺激科技产业的发展，提高经济结构中的科技含量，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的差距；而要提高经济结构中的科技含量，一项重要战略是发挥模仿优势。科技产业模仿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进模仿，从而获得技术模仿式创新收益。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包括自主性创新和模仿式创新，其中模仿式创新可以获得技术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技术创新风险规避收益以及技术改良升级收益等。日本是一个依靠其内部资源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但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以及组织模仿可谓达到极致。日本当年建立陆军体系先后模仿了法国和德国，建立海军体系模仿了英国，建立通信系统模仿了英国，建立银行系统模仿了美国，等等。

科技产业的发展除了本身能创造巨大经济价值和财富外，还能因为“被嫁接”、“被融合”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提高其他产业的运行效率。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来的汽车产业、电力产业以及石油产业除自身为当时的社会创造巨额经济价值以外，还促进了第一次产业改革发展起来的纺织业、造船业等传统产业的发展。

中国必须把握新一轮科技发展机会

中国经济经历30年的发展，已经积聚了一定的经济成果，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到47万亿元，但

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依靠资源投入，要想改变这种经济现状，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科技产业。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必须把握美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产业的发展机会，不要错过这个良机。

美国经历史次危机的洗礼，进入依托科技产业的新一轮经济发展期，这一轮经济发展期或延续10年到20年。2012年3月中旬，美国纳斯达克指数表现抢眼，触及3039.89点的高位，创出2000年11月以来最高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者看多美国科技产业的未来发展，对美国科技产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2012年3月中旬还发生了一件事，值得格外关注。美国、欧盟和日本正式向国际贸易组织(WTO)针对中国限制稀土出口问题提出诉讼，这是美、欧、日首次同时提出诉讼。美国官员认为，稀土材料应用于从混合动力汽车到手机的电池等高科技产品，能够制造先进的电池和混合动力汽车对美国极为重要。欧盟贸易官员认为中国对稀土等产品的限制违反了国际贸易准则，损害了欧盟和全球生产商与消费者的利益，包括高科技产业制造商和绿色商务应用。欧美与中国打稀土官司恰恰说明欧美国家科技产业正在复苏或正在刺激科技产业的发展。

中国依据自身经济形势调低2012年经济增长率，是明智选择。中国调低经济增长率是为了转变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高级化”。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从过度依靠房地产业的经济结构逐步转移到新兴产业上来，逐步转移到科技产业上来。

中国房地产业经历2005年至2011年的一波大发展，其经济价值基本已被经济体系消化，中国需要依靠其他产业引领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中国发展科技产业或发展新兴产业，单靠自主创新需要相当一段时期，通过模仿式创新是必然选择。中国对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关键零部件进口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中国进行技术模仿式创新，对于中国加速实现产业结构从依赖房地产业向科技产业或依靠新兴产业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与中国发展高端制造业的产业战略是一致的。

科技产业包括的门类较广，受资源约束，中国发展科技产业应避免遍地开花，应选准2到3个子行业重点发展。18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主要在纺织业，19世纪60年代兴盛铁路产业，20世纪90年代科技发展主要依靠信息产业。中国推进科技产业的发展同样应依据自身要素禀赋，选择少数具备发展潜力的科技子行业重点发展、重点突破。

中国一些城市热衷于搞金融中心，无可厚非，但多发展几个高科技城市同样重要。美国拥有波士顿、圣迭戈、奥斯汀、华盛顿、旧金山等不少世界级的高科技城市。中国应向美国学习，建立几个像样的高科技城市，而不单单是热衷搞金融中心城市。

(作者系经济学教授、西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

■舆情时评 | First Response |

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不能再拖了

周荣祥

国家发改委日前宣布自3月20日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限价上调600元/吨。

此次油价调整符合市场预期，但上调幅度之高颇为罕见。从原因分析，一方面是因为目前通胀压力减缓为本次调整间接提供了条件，但更多的原因则在于，迅速缩小国际国内价差，有利于为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提供条件。

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从2009年5月开始正式实施。该机制的核心为，我国成品油价格实行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有控制地间接接轨”，以一定时期内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平均水平为基础。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汽、柴油价格。这一机制实施两年半以来，饱受市场诟病。原因很简单，尽管相关部门一再否认，但由于现行机制运行的复杂性和隐秘性，在客观上造成了国内油价“涨快跌慢”的事实。譬如，简单从技术分析，假定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是100美元/桶，当价格连续上涨4美元时，涨幅达到4%，即可调价。但当油价从104美元回落至100美元，跌幅却仅有3.85%，不符合下调条件。而在真实运行中，现行的机制则更加复杂。譬如，国内成品油到底参考哪三地的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三地各自权重又是多少，连续22个工作日到底该如何计算？在国际原油参考对象上，多数研究机构默认为布伦特、迪拜和辛塔，而不包括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因为其属于北美区域，并不是

中国的主要进口对象。但在过去两年间，发改委在解释为何要上调油价时，却常常以WTI价格走势为依据来说明调价的必要性。

伴随着油价的一路高涨，国内对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的呼声也日益升高。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未来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可能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缩短22个工作日的调价周期，明确国家原油参考对象，缩小涨幅等。如此，可以增加成品油定价机制的透明度和灵活性，有利于防止投机炒作。这只是技术上的调整，对于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而言，可能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首先，就是要解决旧机制导致的“涨快跌慢”问题。因此，如果在国际原油处于一个上升通道时，推出改革方案，即使新机制科学合理，但效果上可能会依然给公众造成一个跟涨不跟跌的印象。因此，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就是，首先缩小国际国内价差，达到有限接轨；然后在国际油价稳定或者处于一个下降通道时，顺势推出。从本次调价的幅度来看，推出新的机制基本上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此外，理顺成品油等生产要素价格关系，对于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至关重要。此次调整，也间接表明了政府在尽快理顺资源价格改革方面的决心。不过，在目前油价高企的背景下，如果简单就油价而进行改革，可能会对社会经济运行造成巨大负担，因此，推进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可能还需要政府在削减消费税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中国网站遭攻击，人民当然很生气。境外黑客不检点，本土科技要给力。门户风险非小事，信息安全是课题。跨境监管不可少，居民上网应警惕。

薛红伟/漫画
孙勇/诗

世行行长“世袭”何时休

林华

世界银行新行长人选提名于今年3月23日截止，世界银行将于今年4月春季会议前选出新行长，以接替将于6月底卸任的世行行长佐利克。世界银行总部设在华盛顿，是世界上主要的政府间金融机构之一。美国是世界银行的最大股东，长期以来世行行长一直由美国人担任，这次也不例外。美国在世界银行中拥有15.85%的表决权，其足以否决任何动议，即作为世行的最大利益相关者，如果有非美国人试图主持世行工作，美国定会行使一票否决权。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2月15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将在几周内推出新行长人选。世界银行已设定了一套程序确保领导职务有序过渡。奥巴马政府已经拟定了一份候选人名单，但尚未确定最终人选。外界猜测，美国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及美国现任财长盖特纳可能成为佐利克的继任者。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表示，希拉里、克林顿无意出任世界银行行长一职。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奥巴马拟提名美国前财长、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继任，曾执教哈佛大学的萨默斯已向白宫表达了执掌世行的

兴趣。由于萨默斯过去反对加强金融业监管，一旦获提名，可能招致不满他松绑银行管制立场的民主党人的批评，也不是合适人选。

外界猜测，美国现任财长盖特纳很可能成为佐利克的继任者。盖特纳虽然没有表现出继任的意愿，但盖特纳去年曾一度打算辞掉财长职位。分析认为，世行行长一般由美国总统提名，佐利克是共和党人，2007年由美国前总统布什提拔为世行行长，而现在出任该职位的很可能是民主党人。因为世行行长同时兼任国际开发协会会长、国际金融危机公司主席和多国投资保证机构的主席等职，奥巴马不会轻易将该职位拱手让出。

与以往不同的是，世行行长的甄选已经不再由美国人上演“独角戏”，代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砖五国”前所未有地吹响了参选世行行长候选人的“集结号”。约60个国际发展组织及活跃人士联署呼吁美国，让发展中国家就选择继任人享有更大话语权，打破美国长期垄断职位的局面。

有分析认为，挑选世行行长应依据候选人的个人条件，而非国籍，国际需要一个符合更多国家利益的世界银行，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想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而以中国、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一直寻求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扩大发言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日前表示，中方希望世行会以“公开、竞争及择优的原则”，选出接班人，暗示不应由美国内定钦点。巴西方面表示，佐利克的继任者选拔应该遵从“择优录取”原则，不应该继续根据国籍来任命。

在刚结束的2012年首届G20财长会议上代表新兴经济体的“金砖五国”决定统一推选出候选人竞争世界银行行长一职。在187个成员国的世行大家庭中，金砖国家发出此种声音在世行历史上尚属首次。

金砖国家公开亮明自己竞选世行行长的态度，其所折射出的是全球经济重心正在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客观经济现实。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国家经济陷入衰退，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却大幅上升。当前世界经济GDP增长的近70%由新兴经济体提供，全球购买力的一半来自新兴经济体，并已超过发达国家购买力。显然，在世界经济发展和力量格局发生明显重构的背景下，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要求在更高层次上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是作为“二战”之后首次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两大世界性金融机构。根据当年欧美大国间不成文的约定，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而世界银行行长则由美国人担任。

建立新秩序很难，打破一种既定的秩序和规则往往更难。这一方面是因为美欧不愿轻易放弃这一有利传统，特别是在大选年期间，如果美国人失去为世行资格，其国内政治压力势必上升；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能否在现阶段就候选人形成共识还是一个问题，这在去年IMF总裁遴选时已经体现出来。不过，无论世行新行长最终来自美国还是新兴经济体，要想在未来开展工作时得到更多支持，得到新兴经济体的广泛认可必不可少。因此，预计和IMF总裁拉加德一样，可能的新行长候选人在参选期间也会抓紧游说新兴经济体，并在政策上向后者示好。

因此，现阶段人们可以期待的是新兴经济体在世行中的代表和话语权逐渐提升。例如，在份额已确定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可利用此次新行长拉票之机要求增加在世行高层领导人中的代表数量，而这对于未来世行的决策方向也意义重大。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 发电邮至pp118@126.com。